

以开放促改革 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完善成品油价格机制正当时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中心主任 林伯强

近期国际油价持续下行,原油价格在几个月内从每桶100美元迅速跌至60美元左右,受此影响,国内成品油价格也相应连续下调。近期国内成品油价格因消费税提升而缩小下调幅度,由此,成品油价格机制进一步完善呼声愈加强烈。笔者认为,从改革的机会和影响看,当前推进成品油价改时机正好。

推进成品油价格机制市场化改革方向已是共识,但改革是有条件的,主要考虑价格改革后如果油价大幅上涨产生的影响。因此,改革应在国际油价比较低的时候推进。油价大幅下跌和国内需求放缓是改革的基本条件。

从目前原油市场情况看,近年来国际石油市场供需格局发生较大改变,卖方竞争加剧、买方需求不足、原油市场供给过剩,造成目前原油价格大幅度走低。可以预期,国际原油价格疲弱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因此价改推进后,成品油价格出现大幅度上涨而超过公众承受能力的可能性较小。

从国内需求看,经济新常态使能源需求增长放缓,也是推进改革的一个基本条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能源价格长期受到管制,政府运用成本加成原则来制定能源价格,公众也因此习惯了管制的能源价格体系,对价格上涨非常敏感。作为发展中国家,能源价格改革总是受到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限制,因而进展缓慢。在环境和能源约束日益凸显的情况下,目前整体而言公众还是倾向于改革,政府应该利用这一点,及时推出改革。

按2013年3月底出台的成品油价格机制,国内汽柴油价格根据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变化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当调价幅度低于每吨50元时不做调整,纳入下次调价时累加或冲抵。目前成品油定价机制在能源价格改革中算是比较成功,尽管有滞后和不到位的情况发生,但一般只要国际油价跌,国内油价也会相应跟着下调。

虽然现行成品油价格机制将国内成品油价格与国际原油市场价格挂钩,但基本上还是典型的政府定价,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国内油价每期调整由政府宣布,这导致油价调整的不确定性,因为政府可以由于某种原因而选择不宣布调整,或者不足量调整。比如,今年第9次调整落空就是因为调价与调税一起进行。当然,不是说,完善价改后就不能提高成品油消费税,但不会像现在这样简单方便地进行相抵。

目前成品油价格机制改革的重点应是政府将成品油调价发布权交与第三方机构,即按照政府定价机制所规定的周期和公式计算调价幅度,由第三方机构审核和宣布,政府进行监管。这样有利于避免油价调整滞后和不足量调整,增加调价的透明度。调价由第三方机构宣布,并不意味着有权对油品定价,价格调整依旧按照政府成品油定价机制的方式进行调整。理论上说,政府宣布的调价幅度和由第三方发布的数值可能是一样的,但其改革意义在于,调价宣布权交与第三方,实际上是变政府定价为政府监管,因此将是成品油价格机制最重要的改革步骤。

第三方宣布调价而不是由油企自主宣布调价是为了保障公平,因为目前成品油计算公式中的一些因素需要保密,如果让国有油企掌握宣布权,则是对民营企业的不公平。实际上,第三方宣布权为油企提供调价的确定性,可为他们提供相对稳定的运行环境,改革之后,成品油价格基本接近价格市场化,许多发达国家的能源价格调整机制大致也是如此运行。

应当说,完善成品油价改对各方有着不同影响。对于政府来说,可以让政府部门从日常频繁的事务性工作脱身,减少社会质疑;对石油企业来说,改革是重大利好,因为对石油企业来说无论油价涨跌,只要及时调价,采取国际接轨定价机制都会保障油企的合理回报,关键是第三方宣布权提供了调价的确定性;对消费者而言,成品油价格调整将更及时、更确定、更透明。

完善成品油价改有利于民营资本参与能源行业,推进混合所有制。长期以来,能源价格被当作政策工具使用而导致价格扭曲,价格形成机制的不合理、不透明、不确定,增加了民营资本进入能源领域的风险。基于确定的收益预期是民营资本参与的基本条件,第三方调价宣布权将提供价格调整的确定性和透明度,有益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政府部门应更多进行宏观战略制定和施行,逐渐从能源价格制定者转变为市场监督者,确保能源体制、准入、价格、市场的有序运行。

总之,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和供需格局改变,成品油价格机制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窗口”机会。成品油价格机制进一步改革的重点在于将价格调整发布权交给第三方机构,改政府定价为政府监管,增加调价的透明度和确定性。

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谋发展,更加注重学习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同世界各国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改革开放才能跃上更高的水平。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也使世界上的主要自贸区发生一系列深刻变革。如从货物贸易为主,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重转变,且更加注重服务贸易发展;由贸易功能为主,向贸易功能与投资功能并重转变,更加注重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由在岸业务为主,向在岸业务与离岸业务并重转变,更加注重离岸功能的拓展;由贸易自由政策为主向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政策联动转变等。对此,习总书记鲜明地指出,我们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挥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好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提升我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能力,也是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

习总书记指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深化改革,时刻考验着我们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考验着每个党员干部的聪明才智。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对外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在眼界上、思想上、知识上、技术上走向开放,通过学习和应用世界先进知识、技术和规则,不断把整个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如果思想禁锢、心胸封闭,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对外开放。全党同志要牢记习总书记的指示,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要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力将改革开放推向新境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动力。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改革开放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 “韬光养晦,谦受益。”只有不封闭、不

硬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所作出的重大决策。

“失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不会一成不变,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和新的科技革命风起云涌的今天,全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各国各地区间经济、科技、文化联系日益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可能闭门造车、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持续深化开放,使中国经济更深度地融入全球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智者,难得而易失也。”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对于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代中国而言是又一个历史性机遇。当今世界,在话语权、标准权、游戏规则制定权等方面,越早参与、越早做决断,就越主动、越受益。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壮大、新科技革命的出现和经济全球化的提速,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正在剧烈重构。这“最大的一轮重构”主要表现在:规则谈判的平台由以往的多边关系平台向伙伴关系平台转移,规则谈判的重心从贸易规则向投资规则、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实体贸易向数字贸易、关税壁垒向监管壁垒、边境措施向境内措施、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经济标准向价值标准等所谓21世纪新议题转移。以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趋势为例,除了中日韩自贸协定(FTA)谈判,还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东盟与中日韩(10+3)自贸等,无不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新特点。面对世界经济新的历史转折,面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巨大变化,我们必须主动作为、顺势而上,紧紧抓住和用好这一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以大气谦和、海纳百川的气度,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敢于拿出实质性强举措,力争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各项规则的制定者、引领者。

“开放倒逼改革,是我国改革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从上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闯出一条新路’,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开放倒逼改革的层级进一步跃升,我们开放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歇。进入新世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纳入经济全球化轨道,对接WTO规则带动了不少实际性的改革举措;上海自贸区建设,则是中央在新形势下面向世界的主动试验。就这样,30多年来我们按照从沿海到内地的梯度开放战略,开放空间从经济特区到沿海港口城市再到沿江、沿边及内陆省会城市;开放范围从贸易领域到投资领域,开放内容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开放维度从经济活动到社会服务,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开放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开放的前提是参与,参与的前提是适应,适应的前提是改革。设立自贸区,是中央从全局战略高度谋划的改革开放大棋局中,既谋子又谋势的一招“先手棋”,也是在新的历史阶段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一个压力测试平台,其核心目标是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努力探索形成与国际贸易规则相衔接的制度规则体系和政府监管体系,为全面深化改革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今天,站在更高水平上推进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强有力的抓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已经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

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所作出的重大决策。

“失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不会一成不变,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和新的科技革命风起云涌的今天,全球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各国各地区间经济、科技、文化联系日益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可能闭门造车、关起门来搞建设,必须“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持续深化开放,使中国经济更深度地融入全球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智者,难得而易失也。”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对于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代中国而言是又一个历史性机遇。当今世界,在话语权、标准权、游戏规则制定权等方面,越早参与、越早做决断,就越主动、越受益。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壮大、新科技革命的出现和经济全球化的提速,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正在剧烈重构。这“最大的一轮重构”主要表现在:规则谈判的平台由以往的多边关系平台向伙伴关系平台转移,规则谈判的重心从贸易规则向投资规则、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实体贸易向数字贸易、关税壁垒向监管壁垒、边境措施向境内措施、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经济标准向价值标准等所谓21世纪新议题转移。以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趋势为例,除了中日韩自贸协定(FTA)谈判,还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东盟与中日韩(10+3)自贸等,无不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新特点。面对世界经济新的历史转折,面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巨大变化,我们必须主动作为、顺势而上,紧紧抓住和用好这一宝贵的战略机遇期,以大气谦和、海纳百川的气度,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敢于拿出实质性强举措,力争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各项规则的制定者、引领者。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改革开放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 “韬光养晦,谦受益。”只有不封闭、不

南水北调投资PPP模式值得推广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苏峻

近日,财政部首次对外公布了总投资规模约1800亿元的30个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示范项目,欢迎中外私营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和运营。另一值得注意的事件是,2014年12月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将正式向北京供水,这项历经数十载,投资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的伟大工程,将有效缓解我国北方尤其是京津地区缺水局面。作为国家战略层面的大型投资项目,南水北调工程债权投资计划已经采用了有效的PPP模式,这对推动其他投资项目有一定借鉴意义。

2008年10月21日,国务院批准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一期工程总投资2320亿元,其中东线一期工程497亿元,中线一期工程1823亿元。总投资2320亿元中,1030亿元来源于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该基金的征收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而南水北调工程的投资建设在2014年之前完成。为解决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的现金流与工程建设用款时限之间存在错配的问题,经国务院批准,由财政部主导融资工作,由国务院所属的南水北调办为偿债主体,通过银行等渠道贷款的方式为工程提供过渡性融资,过渡性融资的还本付息则通过后续年度征收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在中央预算内资金予以偿还。

2007年11月,正值上一个经济周期的发展波峰,商业银行5年期以上贷款利率达到了十多年以来的最高峰,为7.83%,而且,市场普遍判断,贷款利率将继续向上调整。如何在融资成本高企的情况下,找到期限长、规模大、利率较低的资金,投资于南水北调这个跨世纪民生工程?在财政部的推动下,经多方讨论和筹划,2009年9月南水北调债权投资计划在太平资产管理公司得以立项。

根据项目内容,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南水北调工程过渡性资金融资主体;还款来源为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财政收入;融资金分年分笔提取,每笔资金融资期限为自提取之日起截至2020年6月30日;融资利率按季度浮动,一、二、三期债权计划分别为央行长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15%、15%和10%;二、三期设置5%的利率下限;还本付息方式为季度付息。

2010年6月,太平资产与国务院南水北调办签署《南水北调工程过渡性资金融资合同》,融资金额50亿元。2011年3月,双方签署《南水北调工程过渡性资金第二期融资合同》,融资金额100亿元。第二期债权计划发行,正逢国家执行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国内金融产品的利率同比大幅上升,国务院南水北调办面临大型银行提款困难、中小银行无法继

续执行贷款合同的严峻时期,第二期债权计划发行亦困难重重。在此背景下,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公司出资认购51亿元,为南水北调工程提供融资服务。

经财政部同意,南水北调办将保险债权投资计划作为南水北调工程过渡性融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三期融资金额由之前预期的150亿元提高到400亿元,并将融资资金利率由一、二期的贷款利率与银行同条件,并设定有利于保险资金管理的基础利率。2011年12月,太平资产与国务院南水北调办签署《南水北调工程过渡性资金第三期融资合同》。

应当说,无论在借款主体、投资项目、还款来源等比较,南水北调工程债权投资计划均是迄今为止行业内信用、资质等级最高的债权计划。

经专业会计师事务所测算,在24种情形假设中,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均可足额偿还保险资金的过渡性融资,还本付息能够得到保障。2010年至今,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实际征收情况良好,均较财政部的测算有大幅增长。同时,自2010年首笔资金拨款至今,南水北调办全部信息收入都按期支付,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南水北调工程债权投资计划一、二、三期合计金额550亿元,占当时保险行业债权投资计划总额的近三分之一;占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

程总投资的近四分之一;占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过渡性融资金额的50%以上,为中国保险行业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一债权计划。

南水北调工程债权投资计划发行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寿、中国人保等20多家保险机构的有力支持,是目前保险行业参与机构最多的债权计划产品;同时还得到了兴业银行等机构的踊跃认购和支持,开创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业外资金的尝试。南水北调工程债权投资计划是中国保险全行业参与的投资项目,是低风险、中等收益的良好投资品种,将为保险行业累计提供250亿元以上低风险的稳定债息收入。

南水北调工程债权投资计划也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深入进行PPP模式改革进行有益尝试。PPP模式是指公共部门通过与私人部门建立伙伴关系、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一种方式。政府与民营机构(包括任何国营、民营、外商法人机构)签订合同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共同或组建SPV(特别项目公司)代替政府建设、运营或管理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并向公共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南水北调项目的成功实施,南水北调项目是探索PPP模式的成功范例,对建立标准化管理流程,探索解决制度障碍,增强政府和社会资本信心,选择项目需要兼顾典型性和可行性,项目符合经济新常态下的趋势性变化”等均有借鉴意义。

人民币国际化为“一带一路”战略保驾护航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 张锐

如果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是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国内战略抓手,那么实施“一带一路”则是延伸到国外市场的重要战略寄托,它不仅直接关系着未来中国经济“走出去”的质量,也直接彰显与决定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提升本领与水平。

具体来看,“带”即指“丝绸之路经济带”,“路”则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有三条路线,即以欧亚大陆桥为主的北线,以石油天然气管道为主的中线,以跨国公路为主的南线。“丝绸之路经济带”东边牵着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大走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除了路上通道外,特指海上路线,即指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往南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波斯湾地区,远及东非、欧洲。统计资料显示,“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

按照顶层设计规划,2014年7月中国已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共同发起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该银行总部设在上海,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由5个创始成员国平均出资。3个月

后,由中国倡导发起,包括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共同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久,印度尼西亚加入,成为亚投行第22个创始成员国。与此同时,中国正计划设立一只规模达1000亿元(约合163亿美元)的基金,即所谓的“丝路基金”。

无论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是丝路基金,共同目的就是支持所在区域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通信管网、港口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最终实现资本输出。资料显示,中国目前的GDP已占到全球GDP的13%,同时拥有高达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走过了通过出口为全球各国提供廉价消费品的一段漫长历程之后,中国对外贸易必然自动地发生转向与升级,即由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

外部市场旺盛的需求构成了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撑。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每年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需求在1万亿美元左右。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10年到2020年,亚太地区约有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需求。另据世界银行测算,从现在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需要量是70万亿美元,平均每年4万亿美元。然而,这些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无一例外地存在资金短缺困扰。

中国高达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用来对外投资,支持相应国家的经济发展。据世界银行估计,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10%,GDP增长率可以提高1个百分点。显然,“一带一路”在造福沿途各国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

中国资本输出的大动脉。

与传统的商品出口以制成品贸易出口为主要特征完全不同,“带一路”下的资本输出可以带动初级产品与制成品双重出口,从而有效化解产能过剩。以高铁为例,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需建铁路总长为1万公里左右,而铁路行业的钢材需求量占钢铁需求总量3%左右,修建一公里高铁需要钢材3000吨,是修建普通铁路的十倍。高铁出口可以帮助国内钢铁行业消耗一些过剩产能。除了带动国内企业加快“去产能”步伐,“带一路”还能有效提升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如通过高铁输出,不仅可以拉动国内轨道交通装备、集成电路制造、光电显示制造、电子信息等行业的出口,还能输出中国标准与技术,从而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的话语权。

“带一路”并不仅仅停留在资本输出层面,而是要以“带一路”为纲,张自由贸易区之目,即“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在

建自贸区20个,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自贸协定12个,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均已实施;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8个,涉及23个国家。从已经在建和实施的自贸区看,无论中国与东盟、中国与新加坡、中国与巴基斯坦、中国与冰岛,还是即将落地的中韩自贸区以及GCEP(10+6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都处于“带一路”之上。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加快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将为“带一路”战略保驾护航。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已在新加坡、伦敦、首尔等九个地区设立了人民币离岸中心或人民币清算场所。中国人民银行已与26个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额度近2.9万亿元。同时,与人民币进行直接交易的货币达14个。在对外结算方面,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至2014年第三季度底达到了4.8万亿元,人民币已超越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并且跃居为30亿元的人民币主权债券于2014年10月经过英国政府发行,这也是首次由西方国家发行的人民币主权债券,同时也是全球非中国发行的最大一笔人民币债券。有了日渐提升的人民币国际化这一战略,“带一路”的推进与实施将获得更多保障。